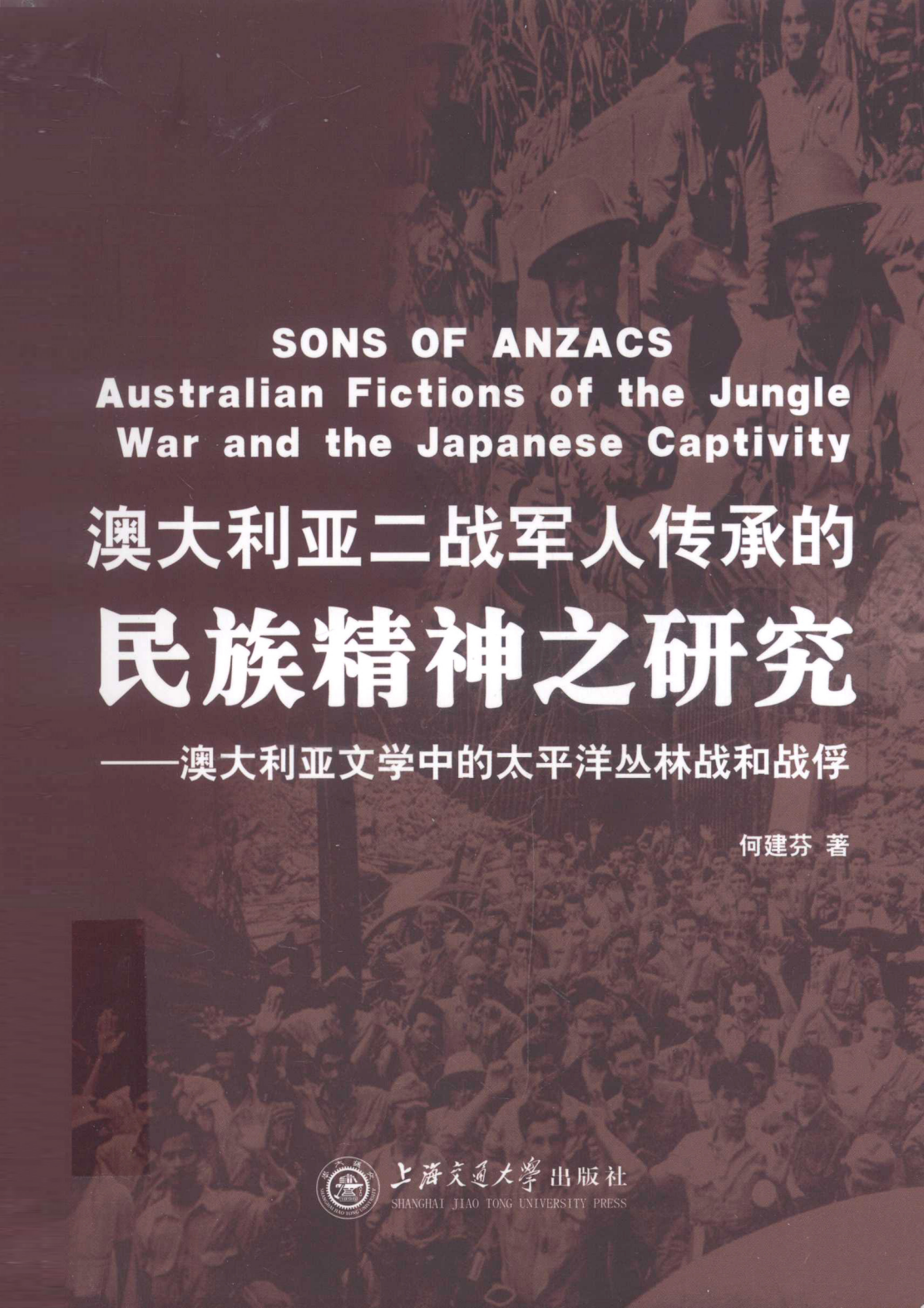




SONS OF ANZACS
Australian Fictions of the Jungle
War and the Japanese Captivity

澳大利亚二战军人传承的 民族精神之研究

——澳大利亚文学中的太平洋丛林战和战俘

何建芬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澳大利亚二战军人传承的民族精神之研究
——
澳大利亚文学中的太平洋丛林战和战俘

何建芬 /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内 容 提 要

本书从民族和民族主义的视角探讨澳新军团神话传奇思想与刻画丛林战和战俘经历的澳大利亚文学作品之间的关系。主要解读三位当代作家的四部小说,包括汤姆·汉格福德的丛林战小说《山脊与河流》和《军帽的使命和军人情结》;伦道夫·斯托和大卫·玛洛夫描写太平洋澳军战俘的两部小说《海上旋转木马》和《伟大的世界》。通过解读这几部作品,认识这些作品是如何延续澳新军团传奇并传承澳大利亚民族精神的。本书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作品中所表现的民族主义的积极因素,特别是从忍耐力的角度讨论了“英雄主义”的定义。在此基础上,讨论了“想象共同体”这一民族主义释义的含义,以及作品中表现出的澳大利亚社会对返乡战俘的不接受心态和对非白色人种在保卫国家中的贡献视而不见的狭隘民族主义等负面因素。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澳大利亚二战军人传承的民族精神之研究/何建芬
著.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

ISBN 978-7-313-08885-7

I. 澳... II. 何... III. 小说研究—澳大利
亚—现代 IV. I611.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85520 号

澳大利亚二战军人传承的民族精神之研究

何建芬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番禺路 951 号 邮政编码 200030)

电话:64071208 出版人:韩建民

上海交大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80mm×1230mm 1/32 印张:7.125 字数:192 千字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30

ISBN 978-7-313-08885-7/I 定价:2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告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联系电话:021-54742979



前言

Preface

澳新军团（Anzacs）在传承澳大利亚传统民族文化中占据的重要位置不容否定。自1921年至今，每年的4月25日为澳新军团节（Anzac Day），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联军在加里波利对土耳其的一场败仗。这场败仗使军团以顽强而闻名于世，从而诞生了澳大利亚民族。可以说澳军以最大的牺牲维护了澳大利亚民族精神，也正是这种牺牲精神和英雄主义气概为澳大利亚人赢得了民族尊严。为此，文人们，特别是战争通讯记者查尔斯·比恩所著的《澳新军团记》以及他的巨著《澳大利亚正史1914-1918》第六卷，史诗般地将澳新军人神奇化，致使澳大利亚人不容任何人对此产生质疑（Kent 1997: 27）。“一战”所传承的民族精神占据着澳大利亚主流文化。毫无疑问，“一战”的文化价值远远超过了“二战”。原因在于“一战”加里波利战役的惨烈和壕沟战的悲壮塑造了澳新军人的英雄形象，而太平洋战争中丛林战的平凡和日本铁蹄下的战俘所蒙受的羞辱和身心折磨则无资格享有“一战”澳新军人的荣耀。因此不难理解澳大利亚人宁可赞美“失败”，也不愿接受羞辱和平凡。

然而，作者在研究中发现，再现澳大利亚的“二战”文学作品的创作思想丝毫没有脱离“一战”澳新军团的传统精神。相反，反映太平洋丛林战和澳军战俘的文学作品为传承澳新军团的民族精神做出了重要贡献。从另一个角度讲，“一战”澳新军团的传奇精神在澳大利亚传统文化中占据重要位置，而“二战”中的澳新军人正

是在延续和建构这种传统文化。他们在新几内亚丛林战和缅甸泰国边境的战俘经历向世人宣告：正是这种民族传统精神使他们承受住种种热带疾病的痛苦、环境的折磨以及日军魔掌下非人的肉体和心理摧残，胜利走出丛林和战俘营。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所承受的痛苦和折磨不亚于“一战”澳新军人的惨烈和悲壮。他们同样应该受到尊重。然而应该意识到，澳大利亚人很难改变他们的观念并给予“二战”澳新军人们应有的尊重（Gerster 1995: 9）。因为“一战”的加里波利已经成了澳大利亚荷马史诗般的代名词（Carlyon 2002: 533）。

当再度确认“二战”在建构澳大利亚民族精神过程中所做贡献的时候，我们必须意识到澳大利亚“二战”文学对此的贡献。本书从民族和民族主义的视角探讨澳新军团神话传奇思想与刻画丛林战和战俘经历的澳大利亚文学作品之间的关系。本书主要解读三位当代作家的四部小说，包括汤姆·汉格福德（Tom Hungerford）的丛林战小说《山脊与河流》（*The Ridge and the River*, 1952）和《军帽的使命和军人情结》（*A Knockabout with a Slouch Hat*, 1985）；伦道夫·斯托（Randolph Stow）和大卫·玛洛夫（David, Malouf）描写太平洋澳军战俘的两部小说《海上旋转木马》（*The Merry-Go-Round in the Sea*, 1965）和《伟大的世界》（*The Great World*, 1990）。通过解读这几部作品，认识这些作品是如何延续澳新军团传奇并传承澳大利亚民族精神的。本书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作品中所表现的民族主义的积极因素，特别是从忍耐力的角度讨论了“英雄主义”的定义。在此基础上，讨论了“想象共同体”这一民族主义释义的含义、作品中表现出的澳大利亚社会对返乡战俘的不接受心态以及对非白色人种在保卫国家中的贡献视而不见的狭隘民族主义等负面因素。

汤姆·汉格福德是澳大利亚当代最著名的作家之一（Crouch

2005: 1)。《山脊与河流》是澳大利亚战争文学中第一部深刻揭示战争中军人内心矛盾的小说 (Dunlop in Hungerford 2003: ii)。具体地讲, 汉格福德基于自己在布德维尔岛的亲身经历, 详细刻画了丛林战的极端作战环境对于军人超常的心理要求, 塑造了战斗在丛林中面对恐惧和残酷所表现出内心自豪和骄傲的军人形象 (Crouch 2005: 133)。《山脊与河流》自1952年问世以来, 分别在1966年、1979年和1992年由三个不同的出版公司再版。小说在澳大利亚享有广泛的读者, 至今达半个多世纪之久。2003年企鹅出版集团再版此书, 再次确定了该作品的文学价值。汉格福德的贡献在于他的作品思想价值, 因为作品真实地记录了澳新军团士兵在新几内亚丛林战的战斗经历, 使后人更好地了解父辈在战争中的牺牲对弘扬澳大利亚民族主义精神所起到的重要意义。小说刻画了从军官到年轻士兵以及非白种士兵不同的角色, 从不同的侧面再现了丛林战中军人的平凡, 又从这些角色中所谓不完美的性格, 特别是从他们的心理矛盾斗争中找到这些军人身上的优秀品质和英雄主义精神。这部作品的魅力在于汉格福德并没有将他的士兵刻画成毕恩笔下的神奇军人, 更没有血与火、戏剧般的轰动和惨烈, 而主要讲的是丛林突击队四天的侦察故事 (Hosking 1985: 240)。然而, 看似简单的任务, 却要求每个军人必须有超强的、能够在日军包围中、在食人般恐怖的丛林中生存下来的心理承受能力。也正是心理的磨练铸成了这些军人的军魂。“二战”军人并没有像“一战”军人那样被理想化, 正如澳大利亚文学评论家格斯特所说, “二战”军人的形象是“面对千万个艰难困苦”也从不抱怨的“无言的英雄” (Gerster 1995: 10)。

《军帽的使命和军人情结》创作于“二战”结束40后年的1985年, 是汉格福德的自传故事中三部曲之一, 2003年由弗里曼特尔艺术中心出版公司整理出版。《军帽的使命和军人情结》的写作笔调

较《山脊与河流》更富有内涵，读者能透过一件件小事读出军人的使命感和荣誉感；读出一个退役军人的怀旧情感；读出深刻、不容浮夸的境界；读出认真写实的绝妙和与众不同（Crouch 2005: 205）。这本书仍以汉格福德的丛林战经历为背景，主要写退役后的生活。全书由12个故事构成，表面看书中的12个故事之间互不相干，每个故事都有其独立性，侧重他生活的各个阶段，但是，一旦将这些故事放在一起，自然成了他的战争生活自传，紧紧地与其战争经历连在一起。似乎军人的使命是一种赶不走的情结。然而自传故事写的并不完全是汉格福德本人，而是在写澳大利亚军人的品质。该书名的隐喻处理使读者更清楚地看到军人四海为家的命运和为国捐躯的使命密不可分。尽管军人的生活意味着漂泊、吃苦、牺牲，然而军人生涯锻造了军人品质，他们骨子里的军人品质不会因摘掉军帽就随之消失。似乎他们身体中流淌着的血液被注入了军人的特质。正如汉格福德在三部曲的前言中告诉读者的那样：对于任何一个战士来说，军旅就是执行特殊使命。没有什么能像几年的军人生活那样，能如此改变你对生活的看法，而且任你的躯体和大脑自由翱翔。这种时刻不会因战争的结束而结束（Hungerford 2003: 201）。本书作者认为，是汉格福德军人的使命感让他再次在该书中塑造了澳大利亚军队官兵之间和谐和平等的关系，讽刺了违反澳新军团传统的傲慢和凌驾于士兵之上的行为，并从细小的情节再现了《山脊与河流》中战士们孩子般的稚气、智慧、幽默和自我牺牲精神。

《海上旋转木马》的作者伦道夫·斯托是澳大利亚著名的小说家和诗人。美国作家雷·威尔班克斯在其博士论文中概述了斯托在澳大利亚及西方的文学地位，同时指出《海上旋转木马》的写作富有诗歌韵味并充满现实主义风格。小说中的人物不是他的凭空构想，而是来自于他的家族和儿时的朋友（Willbanks 1973: 5）。安

东尼·哈斯尔强调,《海上旋转木马》和斯托以前的小说相比更成熟、更成功(Hassall 1973: 58)。哈斯尔还指出《海上旋转木马》“是‘二战’以来问世的澳大利亚最优秀的小说之一”(Hassall 1986: 98-99)。《海上旋转木马》可以说是一部战争小说,然而小说焦点不是写战火纷飞的战场,而是瞄准战俘的经历及其影响。斯托通过罗布·克拉姆,一个6岁男孩主人公的眼睛透视太平洋战争给澳大利亚人带来的影响。斯托让罗布通过与表哥瑞克·梅普尔斯特德的对话,似乎看到瑞克在太平洋战争中成为缅甸泰国边境铁路的战俘经历给他造成的心理创伤,以至于使他无法摆脱噩梦的纠缠。这使罗布在瑞克所承受的战争痛苦中渐渐认识到战争给军人带来更多的精神折磨。战争让罗布渐渐长大,也渐渐改变了他对战争和世界的认识。斯托把海上旋转的木马作为小说题目,象征着一个永恒稳定的中心旋转时所形成的“圆”,一个罗布熟悉的、安全、稳定、持久、并享有田园美丽的世界已受到战争的威胁。他感到战争使瑞克变得陌生,他再也无法回到从前。斯托不是在写军人的英雄行为,而是在写战争给人们带来的心理灾难。劳里·赫根汉指出,斯托“选择写战俘而不是写战场本身说明他看战争的角度发生了变化,即战争不是荣耀而是折磨”(Hergenhan 1985: 250)。斯托通过描写罗布对战争的恐惧、对瑞克生死的担忧,通过描写战俘受到的非人待遇以及生不如死的日子,让读者理解是战争毁掉了他,使他无法再过正常人的生活。这是因为:长期令人绝望的奴役使战俘毁掉了自尊,失去男人的气节,加上对敌人的刻骨仇恨,战俘们承受着日益严酷的心理考验,而这种严酷的心理折磨不会因他们的解放而结束(Gerester 1988: 347)。能够解释这种情结的是瑞克自己对战争的认识:

战争是另一个国家。无论你为哪一方而战,不管你赢了还

是输了，只要你参与了战争，你就成了地图上不存在的另外一个国家的公民。那个国家拥有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文学艺术和自己的音乐。一旦你成为那个国家的公民，就真的不能再回到人们所熟悉的国度，因为你绝不会放弃那里的公民权利。在那个国家里，没有生命，只有死亡，然而那个国家却能永远不消亡，因为当战争有了自己的语言，它的歌曲就成了孩子们的一部分，那些歌曲便成了对英雄主义的怀念，因此，每隔大约20年左右，那个国家就重建一次，并且死亡便轰轰烈烈地开始。

(Stow 1968: 165)

瑞克对战争深刻的理解表现在强调战争的恐怖和黑暗，而不是对战争的歌颂。战争使瑞克的身心变得与世隔绝，把他打造成了地道的另一个国家的人。他已经不能回到现实的国家，变得与世人格格不入。实际上，斯托在抨击民族主义的狭隘给军人心理带来的创伤。对于他，英雄主义是虚伪的空想，是忽略了战争破坏性影响的怀旧。斯托用瑞克对战争的理解，告诉人们《海上旋转木马》不是将澳新军团神奇化。而确切的含义是：澳新军团之谜是“死亡文化”的一部分。马可·麦肯纳(Mark McKenna)在解释澳新军团之谜时说：加利波利战役说明的是一个新的民族最终傲立于世界，战场急需大量的牺牲(McKenna 2007: 16)。由此看来，斯托在小说中表达了他对澳新军团文化的批判态度。特别是小说中提到的战争中“同伴友情”之美德不再被歌颂，反之，它在现实社会中失去了威力。因此看出斯托对于战争的态度不同于马洛夫在《伟大的世界》中所呈现给读者的。

大卫·马洛夫是澳大利亚当代重量级小说家，他的写作以“穿越历史长度、深度和广度而超越同行”(Taylor 1994: 35)。《伟大的世界》正是以澳新军团精神架起其故事结构。在此基础上，用

诗一般生动的语言刻画出战俘经历以及他们经历的心理过程，神化了澳大利亚“二战”士兵。小说通过写两代人在“一战”和“二战”的经历，实现了历史的跨越。马洛夫是澳大利亚第一位在聚焦日本铁蹄下澳军战俘的同时，用笔墨将两次世界大战贯穿在一起的作家，因为马洛夫坚信“‘二战’当然是‘一战’（精神）的延续”（Malouf 1985: 268）。这里马洛夫强调了“一战”和“二战”与澳大利亚民族及其民族自豪感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伟大的世界》恰到好处地实现了这一目标。马洛夫之所以展现给世人这样一部作品，是因为他的“兴趣在于写澳大利亚民族的经历，而不是只写战争本身，两者不能轻易分开”（Malouf 1985: 265）。马洛夫的作品传承了澳大利亚的民族精神。艾弗·因迪克评论说，《伟大的世界》是第一部史诗般的长篇小说，小说“尤其以澳大利亚军队在缅甸泰国边境的苦役经历，深刻揭示了澳新军团神话最实质的内涵”（Indyk 1993: 91）。罗杰·伯克在他的研究中再次强调说：马洛夫“重新为澳新士兵建构了这个神话”（Bourke 2006: 140）。毫无疑问，马洛夫的作品以战俘营中士兵们在日复一日难以忍受的折磨中所表现出来的“同伴友情”，以及这种情谊中反射出来的无声的高尚品质，延续了澳新军团传奇般的神话。

《伟大的世界》首尾都聚焦在现在，表明马洛夫是写澳新军团传统在现实生活中的意义。作品中的主人公迪格尔（Digger）的命运紧紧地与传统的澳新军团士兵的历史命运连在一起，无疑马洛夫把其主人公神奇化成为一个性格正直、心理健康、意志坚韧的理想化人物。他的内心拥有一个宽广的伟大的世界。迪格尔和维克（Vic）的关系的维系靠的是一种精神力量，在这一点上，《伟大的世界》的笔调比其他作品更加浪漫，写出了士兵们在战俘营中相互关心的道德情操和高尚行为。作品以着重写“二战”士兵的方式，挑战了“一战”传奇在澳大利亚政治生活中的统治地位。与此

同时着重写了“同伴友情”在“二战”文学中以及在定义英雄主义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同伴友情’作为一种道义下的道德准则不受任何约束——为了同伴而不惜任何代价——忠诚是最基本的美德”（Moore 1965: 45）。在澳大利亚士兵中，“同伴友情”已经成为主要意识。丹尼斯·奥特曼认为：

同伴友情具有个体或个人的意思，象征着两个士兵之间的情谊，并且有广泛的社会意义或深层意义，表明同伴甚至团体间的团结一致，该词用于说明罢工人群之间和战俘之间的关系（Altman 1987: 163）。

《山脊与河流》、《海上旋转木马》和《伟大的世界》中表现的“同伴友情”需要士兵给予同伴关爱和忠诚，甚至付出生命。澳大利亚同伴友情具有神话般的特点，即一种信念。澳大利亚战争文学表现的“同伴友情”是澳大利亚独有的，这种方式的“同伴友情”源于生存的需要。

汉格福德、斯托和马洛夫在表现丛林战和战俘的作品中展现出“二战”士兵如何用他们的行动延续了澳新军团传奇并丰富了其内涵。这些作品围绕囚禁给军人造成的心理影响以及争取非白人种权利等问题，证实了巴赫金的观点，即小说作为一种文学类型“能够以其开放性的特点，最大限度地与现实沟通”（Bakhtin 1981: 11）。这种文学叙事直接根据社会、历史背景以及想象共同体的需要，生成创造性的内容。小说的威力在于其将过去、现在和将来联在一起的巨大潜能。其开放性在笔者讨论的这几部作品的人物中均有明显体现。尽管汉格福德、斯托和马洛夫描述人物的方法不同，然而，他们各有自己独特的风格。汉格福德笔下的人物是以他们独特的品行打动读者，尽管人物之间存在思想分歧，但是他们

奉行“同伴友情”这一澳新军团传统思想。斯托通过刻画人物来批判澳大利亚民族主义的狭隘所造成的对前战俘的不公平待遇。与斯托不同，马洛夫的人物刻画与澳新军团神话相一致。他笔下的人物以常人没有的忍耐力和坚忍不拔的意志力承受住了日本人的折磨和精神摧残，这种经历使他们经受了考验，他们在兑现对同伴的承诺和为同伴做出牺牲的同时又在相互支撑、相互鼓励中存活下来，成长起来。他们同样是英雄，在澳大利亚作战史上有浓浓的一笔，对传承澳新军团精神有不可磨灭的功绩。

本书初稿完成于2007年7月。在此谨向我的导师Kieran Dolin博士表示衷心感谢，感谢导师给予我研究过程中的耐心指导和帮助。因为作者水平有限，此书尚存不足之处，敬请专家批评指正。

何建芬

2012年2月26日

于天津医科大学

Abstract

The book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deology of the Anzac myth and a selection of Australian fictions about jungle warfare and the prisoner-of-war experience in World War II. It examines literary presentations of the New Guinea campaign and the POW experiences under the Japanese and how they contribute to the continuity of the Anzac legend and to Australian identity. The texts used for the study of the jungle war in New Guinea are T. A. G. Hungerford's *The Ridge and the River* and *A Knockabout with a Slouch Hat*. For the POW experience, the study discusses Randolph Stow's *The Merry-Go-Round in the Sea* and David Malouf's *The Great World*.

The study draws on critical theories of the nation and nationalism to frame its textual analysis. It examines how certain constructive aspects of nationalism, including the redefining of heroism in terms of endurance, and the composition of an imagined community are demonstrated in the texts. Negative aspects of nationalism are also examined, particularly the texts' representation of communal narrow-mindedness, social incomprehension of POW experiences, and the lack of recognition of non-white soldiers' contributions to the defence of Australia.

Each chapter focuses on a particular text. Chapter one explores how the Anzac ideology of mateship is combined with realist characterization in *The Ridge and the River*, producing a study of conflict as well as comradeship among the diggers. Chapter two analyses the short stories in *A Knockabout with a Slouch Hat*,

focusing on their everyday life of the soldiers. It argues that the book charts Hungerford's emergence as a writer as well as his experience as a soldier. Chapter three discusses how Stow's *The Merry-Go-Round in the Sea* traces the impact of the war on a child and the continuing trauma experienced by an ex-prisoner, critiquing the Anzac myth. Chapter four explores how Malouf draws on the Anzac ideology to frame his narrative and mythologize the Second AIF through a psychological and poetic treatment of POW experience.

Acknowledgements

My heartfelt thanks go to my supervisor Dr. Kieran Dolin who has read my drafts with unflagging patience and proposed constructive suggestions to this study. I am grateful to Dr. Megan McKinlay, who devoted great efforts to facilitate all my visits to the University of Western Australia for the research and writing of this book. I would like to thank Professor Dennis Haskell, whose inspiration and encouragement gave me confidence. I owe thanks to the English Department of the School of Social and Cultural Studies of the University of Western Australia, particularly for their support during my stay on campus.

I would like to acknowledge the assistance of Tianjin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TFSU) for getting me into the programme and offering every possible opportunity for my visits to the University of Western Australia. I am also in debt to Professor You-Qiang Cheng, Dean of the School of English Studies of TFSU, who offered me moral support that saw me through the four-year period of study. I also owe thanks to th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of TFSU that ensured me a sense of support during my study on UWA campus. I am deeply grateful to my mother and my husband whose understanding played a crucial role in willing me to achieve my goal.

Jianfen He

Perth Western Australia

June 2007

Abstract I

Acknowledgements..... III

Introduction 1

Chapter 1

Horror and Heroism in the New Guinea Jungle: *The Ridge and the River*45

Chapter 2

Everyday Life in the War and Its Aftermath: *A Knockabout with a Slouch Hat*77

Chapter 3

Personal Growth and Problematic Survival: *The Merry-Go-Round in the Sea*109

Chapter 4

Friendship, History and Myth: *The Great World*147

Conclusion

183

Bibliography

199